

“视域融合”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复兴”

韦汉吉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 210098)

摘要: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视域融合”涉及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儒学复兴”不可能是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而只能是学术、文化层面的;“儒学复兴”也不意味着儒学将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而是儒学与其他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一个文化的“百花园”。在理念上,不应把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仅仅当作是一个补充,而是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容共济地发挥其独特功能。在操作层面上,需要减少和避免假借“儒学复兴”名号的各种工具主义、功利主义的危害,构建有效的文化运行机制和文化传播载体,促进传统文化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儒学复兴;视域融合;文化载体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3)03-0013-04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的关系,是当代中国主流文化与意识形态建设中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从文化阐释学的角度来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视域融合”问题。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所谓的“视域融合”是指各种异质性因素的融合,它不仅是历史性的,也是共时性的。只有处理好“历史视域”与“此在视域”的关系,才能形成一种既能把握过去又能开创未来的新的理论视域。“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二者在中国先后居于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它们之间存在一种内在联系,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与认同建构必须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的关系。”^[1]因此,必须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复兴”能相容共济并继续发挥各自独特的功能。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语境中的“儒学复兴”

从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经历了从儒学到马克思主义的替换过程。儒家传统在中国源远流长,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自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之后,儒学不仅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官方意识形态,而且渗透到日常生活领域成为人民群众神圣的精神追求。儒家文化在形成、传承中华民族精神和维系中华民族的统一方面有

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自20世纪“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到“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破四旧”等运动,以儒家传统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却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在新思想、新文化与旧思想、旧文化的冲突中,马克思主义逐渐取代了儒学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与此相伴随的,则是“儒学复兴”思潮的时显时隐、时起时伏。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时态来看,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既存在着冲突和区隔,又有共通和融合之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发掘和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注意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容相通问题,并积极主动地吸取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资源。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土壤,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不是绝对的二元对立。毛泽东曾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2]。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多具有较高的传统文化素养,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先进知识分子都是首先从中国传统文化的

收稿日期:2013-03-09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2SJB710019);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CXLX12_0225)

作者简介:韦汉吉(1980—),男,广西平果人,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框架出发来理解、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契合和通融之处,如共产主义与大同社会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生存的文化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成长和壮大的土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被接受、被认同,既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作为救亡图存的革命理论自身具有的巨大感召力,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互济会通的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贯通和融合的过程。

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儒学复兴”,不同于儒学在历史上的两次复兴,即汉代的复兴与宋代的复兴。面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和社会动荡不安,孔子提出“克己复礼”,试图以“周公之典”结束混乱的局面,保持“礼乐社会”。儒学宋代的复兴,也是发生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制度为架构的传统社会,其目的同样是维护等级制度基础上的社会秩序。儒家学说尤其适应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社会,甚至可以成为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流价值,全面渗透到大众日常生活层面,成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当前的“儒学复兴”则是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现代性与民族性交融、反思现代性的结果。在新的时代语境下,重新阐释儒家传统,使儒学与西学、马克思主义之间保持对话与贯通融合,是儒学复兴的根本途径。

在“儒学复兴”的方向上,“政治儒学”提出建立“王道政治”的方案,试图把尧舜孔孟之道作为国家的指导性意识形态,提倡在民间普遍建立儒教社团、协会,恢复家族制,使中国回到政教合一的体制和“独尊儒术”的时代。“政治儒学”的方案违背了历史进程,将儒家传统思想直接引入政治领域并进行制度设计安排,与当代社会不相适应,也与现代文明不相协调,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评论“封建的社会主义”的时候就曾指出,其中“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3]。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儒学已经随着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而终结。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已经建立了牢固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与之相适应。儒学复兴不是可能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而只能是学术、文化层面的。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儒学复兴没有现实基础与可能性,儒学的发展只能走文化更新

的道路。“儒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早已终结,为新的意识形态所代替,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经过自我变革,儒学作为一个学派有可能复兴,成为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元而继续存在和发展”^[4]。儒家传统具有丰富的人文主义思想,但这并不等于说,只有儒学才有助于推动中国的道德、文化建设。只有充分运用和发展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化资源,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时代才能真正到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同时也要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一切人类优秀文化成果,从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思想资源,建设与传统文化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文化,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国文化未来发展应该呈现出这样的一幅图景:“在中国这个古老而又现代的国度里,将出现一个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包括儒学、西学、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文化在内的共存共荣的百花园”^[5]。

二、当代中国“儒学复兴”的现实场域

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是题中应有之义。文化认同始终是维系社会秩序的“黏合剂”,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深层基础,是物质力量无法替代的“软实力”。全球化、现代性、文化认同是一个密切相关的问题逻辑链。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如果不重视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就容易使自己民族的文化身份变得模糊不清。“国家民族的复兴,未必以传统文化的复兴为前提,但国家民族复兴之后,必然回归于传统文化,并以传统文化复兴为国家民族复兴的最高标志。”^[6]国家的实力不仅仅指物质器物层面的强大,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方面的强大同样具有重要价值。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灿烂历史与奋斗足迹的精神表达,是中华民族延续发展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力量。“儒学复兴”是文化发展内在理路的必然演进,也是当代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贯通和融合的过程,“执政党政治文化的再中国化是儒学复兴的重要因素”^[7]。因此,“儒学复兴”在当代中国语境有其生存和发展的场域。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等同于儒家文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多元共生的形态,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诸子百家”的文化传统,佛学、道学、墨学等思想学说,都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弘扬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当代中国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的必然结果。

近代以来的现代化理论往往对传统与现代进行二元论的思考,传统只是被放置到现代意识中的历史沉淀物,甚至被当作是无用的残余范畴。破坏传统往往导致价值体系的崩溃和文化认同的消解,损害了现代化秩序建构过程本身。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的逻辑,带来个人主观价值领域的虚无主义,其消极后果就是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品质无法实现提升。这也助长了个人可能合理但却是非善的欲求,甚至导致了现代人的工具主义、道德危机和政治冷漠。作为一个社会发展的总体性运动,现代化不能脱离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化依托,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是简单的二元断裂与分立,而是可以相互交融、相互渗透与相互转化的关系。现代性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也存在着不少“隐忧”。现代化、工业化所追求的专业化、制度化、标准化,导致了“批发知识”、“快餐文化”等状况的出现,甚至由于对“物”的过度强调而导致忽视精神层面的需求。反思现代性,在科学和理性之外,传统文化有其自身独特的价值。传统文化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但也具有某些普遍性的思想内容,具有超越历史的恒常价值。“传统农业社会的社会架构和政治体制已经消失,但并不意味着与之相结合过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思想与行为方式都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8]传统文化有着与现代文明根本不同的对立面,但也蕴含着大量的精神财富。这些精神资源至今依然熠熠生辉,如儒家传统蕴含着“生生不息”与“刚健有为”的积极进取精神,有“以和为贵”与“和而不同”的思想,强调“其身正”的道德示范性等等。这些思想内容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它们可以转化为今天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宝贵助缘,在文化的交融、渗透中能够为现代社会所认同,并参与新的现代性构建。

儒学复兴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必然提出的课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学将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也不等于儒学将成为未来世界文化的中心。尽管儒学可以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资源之一,但其与现代社会的发展并非完全匹配,儒学复兴不是要照搬照抄传统的思想观念。弘扬传统文化不是要排斥、对抗外来文明的影响和挑战,相反却是在本国、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通过积极吸收外来文化中的有益成分来壮大自己,产生新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并非单纯地指对本己文化的认同,也包括对他文化或异己文化的认同。”^[9]实现自觉的文化认同,要避免民族虚无主义,也要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对历史如果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不但把历史中消极的东西扫掉了,而且也丧失

了传统中积极的东西。抛弃传统文化,割断历史,就失去了文化根基,也就不可能有文化的发展。历史虚无主义使文化认同失去依凭,社会凝聚力下降。狭隘的民族主义往往与原教旨主义互为表里,具有孤立、保守、排外的特征。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假借“儒学复兴”的名号,排斥、对抗现代文明,只能给儒学和传统文化带来灾难,无益于当代社会的健康发展。“儒学复兴”不是复古倒退或是全盘照搬照抄,而是对儒学进行发掘与整理,进行创造转化与综合创新,使之成为我国当代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这就要求对儒家传统文化进行结构性转换,既“克服”,又“保留”。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关键是“克服”传统政治文化的枷锁,并在此基础上纳入现代文明因子;“保留”与现代文明相契合的方面。在理念上,不应把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仅仅当作是一个补充,而是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继续相容共济地发挥其独特的功能和作用。

三、“儒学复兴”的文化运行机制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视域融合”并非一个单纯的问题,而是涉及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关系的问题。“从理论上来说,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融相济之所以可能,二者相互要采取宽容态度。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无论以何种路径复兴都不得不面对的基本情境。”^[10]复兴儒学是服务和服从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而不是维护本民族中某些消极落后的东西。在实行对外开放、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就必须以开放的胸怀和现代的眼光来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儒学的现代重建必须立足于当代世界多元文化、异质文明背景,而不是局限于文化本位或狭隘的本土主义立场,必须着眼于多元文化共同体和公共空间的建设与融合以及中国文化的现实和未来。

当前,对于传统文化的追求已不再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的范围。“国学热”、“读经热”、“孔子热”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大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追逐。然而,假借“儒学复兴”名号的工具主义、功利主义等各种危害适机出现,再加上商业化的侵蚀,儒学复兴之路可谓举步维艰。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政治儒学”已失去社会经济基础,没有再生的可能与必要;而儒学如果仅仅是作为个人的心性修养,则无法共鸣于社会大众,进而也无从抵御现代性的功利主义洪流。“儒学复兴”的一个明显

困境是其思想内容传承出现了“断层”的现象。儒学只能以“精英儒学”的身份存在于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之中,越来越成为一门专业的学问。在教育“西方化”的分科模式中,儒学甚至没有自己生存的独立领域,只能在哲学、文学或者历史等学科下赖以生存。在考试指挥棒的影响下,学校以考试为中心,片面倚重学科知识,这往往加剧了传统文化在教育中的缺失。当前社会大众追逐的儒学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知识”而已,其实践性和真精神却被人们淡忘。再加上受“科学至上”观念和功利主义等思想的影响,在儒学复兴的进路上加剧了知识化的倾向。如果儒学果真成为一种单纯的知识系统,这无疑将会割裂它的“道”与“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所谓“儒学复兴”的“契机”可能成为儒学的“危机”。“道”与“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张力,它们的建立依赖于不同的方式,二者具有不同的内在诉求和品格特质。“尽管‘为道’与‘为学’的差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若因此便将‘道’与‘学’打作两概,认为两者完全难以兼容,则不免既无视人类历史的经验,又流于理论思考上的僵化和简陋。”^[11]儒学的知识形态是儒学存在的基础,儒学的知识化维度是儒学发展的重要支撑。“道”离不开“学”这个载体,即“道”的建构必须奠基于对儒家经典文献及其当代阐释之上。如果没有研读儒家经典文献,没有关于儒学的基本知识,那就谈不上什么“道”。没有一定的文化载体,无法保证文化的传播与推广,儒家传统的丰富内容也就无法为大众所知悉和认同。文本的阅读和基础知识的学习,是重建民族文化传统的必要途径。传统文化无法自发实现现代重建,社会大众也并非必然自动认同和亲近传统文化,需要外在力量的驱动和帮助。因此,构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文化体制,建立和完善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有机结合的文化运行机制,在社会层面、教育层面拓宽传统文化的传播渠道显得尤为重要。

传统文化的传承需要有效的文化载体,如学校教育、大众传媒等。学校在传统文化的继承、丰富和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当前我国的学校教育对传统文化的传承状况不容乐观。课程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有关传统文化课程的缺失势必会导致传统文化传承不力甚至“断层”现象的出现。将传统文化的一系列具体内容纳入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可以彰显其独特的教育价值。传统文化是重要的教育资源,也是重要的教育工具。儒家传统有丰富的人文思想,应该进行创造性转化,在其中渗入现代意识,

并纳入课程体系。学习民族典籍是一种文化上的义务,也是一项“功在少年,利在终生”的工程。儒家传统有丰富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智慧,在教化内容、教化方式等方面有不少可取之处。“‘教化’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系统。”^[12]它表现为工具性与目的性、道德性与政治性的相互结合,是个体内化社会价值观和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过程。儒家教化所弘扬的一些道德价值,如忠信孝悌、仁爱互助、克勤克俭、礼让安分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些思想应该得以传承延续,从而提升个人的心性涵养与素质、塑造和谐融洽的道德与政治共同体。在高度信息化、媒介化的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传播与发展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大众传媒既可以促成文化传播的大众化、世俗化,也可能在“屈尊降贵”的表达中陷入片面的娱乐化和庸俗化。因此,要注重发挥大众传媒在传播与发展传统文化方面的功能,在高雅与通俗、感性与思辨之间寻找传播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效策略和方案。

参考文献:

- [1] 孔德永. 当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的有效途径[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2(6): 91-99.
- [2]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534.
-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4-55.
- [4] 许全兴. “儒学复兴”之管见[J]. 社会科学, 2010(4): 91-100.
- [5] 姜林祥. 儒学复兴新论: 兼谈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向[J]. 齐鲁学刊, 2006(1): 7-12.
- [6] 赵炎峰. 儒学复兴路径与发展困境探析[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5): 38-41.
- [7] 陈来. 执政党政治文化的再中国化是儒学复兴的重要因素[N]. 北京日报, 2011-7-25(17).
- [8] 郭齐勇.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现代化[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9(6): 56-62.
- [9] 陈世联. 文化认同、文化和谐与社会和谐[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06(3): 117-121.
- [10] 丁成际. 历史、现状与未来: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研究的三个面向[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2(4): 195-200.
- [11] 彭国翔. 儒家传统与中国哲学: 新世纪的回顾与前瞻[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9: 12.
- [12] 陈宗章, 尉天骄. “教化”: 一个需要澄清的概念[J].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4): 5-8.